

連載

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(3)

劉道玉

二、小小的牛倌

在舊時的農村中，耕牛不僅是必備的生產工具，而且它與土地、房屋一起構成了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。一般來說，自耕農的人家都養有一頭或者半頭牛。所謂半頭就是兩戶養一頭。由兩戶出資合買，輪流餵養和使用。我記得那時家裡餵養了一頭牛。有時候也與隔壁大伯家合養一頭。那時買一頭成年牛，大約需要兩石大米或五十塊光洋。除了經濟條件以外，飼養耕牛還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，如牛欄、草料和有人放牧、餵養。

我的家鄉地處岡坡地帶，常年少雨乾旱，因此只能飼養黃牛。從我紀事起，我家裡養了一頭黑色老犍，牠是一頭閹割過的公牛。與一般公牛

相比。牠的性子馴順，容易駕馭，易於育肥，體壯力大。

大約從六歲開始，我從二哥手裡接過了放牧這頭黑老犍的任務。由此開始了我的牛倌的生涯。在上學期間的寒暑假，在農忙季節裡，我都是與牛為伴的。

放牛看似容易其實並不是一件很輕鬆的工作。在農村，從事放牧的大多是老人和兒童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半勞動力」。老人們瞌睡少，農牧經驗豐富。了解牧草生長情況，能夠把牛牽到青草茂盛的地方去放牧，所以每當傍晚歸來，他們的牛都吃得溜圓溜圓的。剛開始時，我跟著老人們去放牛，但我的黑老犍總是沒吃飽，每當父親看到牛肚子癩癩的都非常生氣，為此我不知挨了多少打。

在受到懲罰以後，我心裡很是不服氣，心想：爲什麼那些老人們的牛吃得飽而我的老犍卻吃不飽呢？原來成群結隊放牛時，他們的牛走在前，好的青草被前面的牛吃了，我的牛當然也就沒吃的了。明白了原因以後，我再也不跟著老人們去放牛，而是採取了兩條辦法：一是起大早，搶在他們出工的前面，請母親早早地叫醒我，天不亮揣上兩個饅頭牽著黑老犍就上路；二是與老人相背而行，凡是他們常去的地方我都不去，他們朝西我向東，他們就近我走遠。這些辦法果然見效，從此我的黑犍子總是吃得肚子鼓鼓的，牠的皮毛也變得油亮亮的了。每當「微霞尙滿天」的時候，「牧童歸去橫牛背，短笛無腔信口吹」那種悠悠自得，也是我童年的一大樂趣。

有一次，在放牛中我釀成了一場大禍，至今記憶猶新。那一天起得太早，我牽著黑犍子邊走邊讓牠吃草，不知不覺地來到了一片空曠的坡地，四周沒有莊稼地，不擔心牛吃了人家的莊稼。於是，我把牛繩盤繞在牛角上，讓牠自由地

去啃草，而我倒在岡坡上的草地上睡著了。小孩子本來瞌睡就大，再加上那些天裡天天起大早，那一睡覺睡了個把時辰。我一覺醒來，太陽已大晌了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一瞧我的黑犍子不在。我一古腦兒爬了起來，拿著放牛棍和草帽。一邊哭喊一邊尋找我的黑犍子。偌大的山岡，到哪兒去找呢？我感到很茫然。稍定神後，我猜想老犍肯定是尋水喝去了。於是我飛也似的向一片水田衝跑去。正好一位大爺在堰裡放水灌田，我上前問道：

「大爺，你看見了我的黑犍子沒有。」

「你這娃子咋搞的，是睡忘了還是玩野了，你的牛吃了人家的秧苗，被下朱家的人牽回莊子去了，還不快去賠不是！」

我一下子懵了，「哇」的一聲大哭起來。我怕挨打，不敢一個人去，於是硬著頭皮回到家裡。已是晌午了，正好父親收工回來，他見我哭喪著臉問道：

「咋回事？」

「爹，我在岡坡上睡著了。老犍吃了人家的秧苗，被下朱家的人牽走了……」未等我說完，父親暴跳如雷，舉手甩了我兩耳光。我不由自主地向後打了幾個跟頭。他說：

「走，跟我去賠罪，把牛贖回來。」

我們飛快地來到了下朱家，這是一個不足十戶人家的小村莊。我們進村後，一眼就看到了我們的黑犍子，牠被拴在一棵大樹上。父親找上戶主家裡，主人是個五十開外的農民，爲人也還算和善。父親連聲道歉說：

「都是我這不聽話的娃子惹的禍，對不住你們了，是賠是罰我們依你的。」

「你們去田裡看看，你家牛吃了我家秧田一溜兒苗子，造孽呀！咋個賠法，你們看著辦吧。」

經過友好協商，父親提出賠兩斗穀子，對方沒再說什麼，於是我牽回了黑老犍。糾紛解決了，但是挨打的滋味是難以忘卻的，教訓也是深刻的。自那以後，我放牛格外小心，特別是在田

埂地邊放牧時，我總是牢牢地牽著牛籠頭，並牢記駕駛耕牛的要領：牽牛要牽牛鼻子，趕牛要鞭打牛屁股。

放牛和割草都是我小時候的兩項任務，而且是交叉進行的。每當犁田耙地之時，父親和二哥都要把老犍牽去使用，這個空檔中，我得背上籬筐去割草。既要爲老犍準備當日的青飼料，又要爲冬天儲存曬乾的綠色飼料，保證牲口越冬。與放牛相比，割草自由度大多了，有時和村里小伙伴們同行。在休息時，我們或爬樹、掏鳥窩、撿鳥蛋、或跳到塘裡嬉水、捉魚，這些兒時農村生活也頗有趣味，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。

我和三叔的小兒子道華是同月出生。他比我小半個多月，長得比我高比我壯。從小我們在一起玩耍、割草、拾糞大多也是結伴而行。他未上學讀書，但是幹農活樣樣比我強，爬樹比我快，下塘摸魚回回都不落空。那時，我幼小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，暗下决心要與他競爭，一定要比他做得更好。可是無奈，在耕田耙地、下田插秧、

打魚摸蝦等各方面我都不如他，那時我似乎朦朧地懂得，如果以自己的短處去與人家長處競爭，那是永遠不會得勝的。

在農村，犁田耙地、選種播種、打穀揚場都是有經驗農民做的事，父親逐步把這些技術傳授給二哥，準備二哥將來接他的班。十五歲那年，我因為就讀的襄陽中學停辦而休學在家，那時也不知道將來是什麼世道，父親教我學農耕，萬一書讀不成了，就留在家裡務農。他給我上的第一課就是學犁地，那是一塊剛剛收割過芝麻的旱地，爲了秋後播種小麥，需要對它進行翻耕。父親向我講述了操作木犁的要領，做了示範，然後讓我來試。剛開始還算順當，只是犁走得不直，像蚯蚓一樣曲里拐彎的。突然間不知什麼原因，「咔嚓」一聲犁鏟斷了，犁托一下子冒到地面上，我怎麼使勁地按不下去，老鍵拖著空犁亂跑，把犁轆子拖繩與牛繩絞成了一團，不管我怎麼吆喝，牠也不聽我的使喚。我急得哭了起來，並呼喊父親來救助。父親看後擺著頭說：「看來

你是吃不了這碗飯了。還是好好地去讀書吧！」

三、栖入「檐」下的小學生活

由於大哥參加了工作，父母的經濟負擔相應地減輕了許多，從一九四四年秋季起，他們決定把二哥和我轉到蔡陽鋪中心小學讀書，以便接受正規的教育。

蔡陽鋪中心小學位於前街的西頭，坐北朝南，校門口有一座古式的門樓，門楣上方牆壁上校名呈弧形。大門右前方約五十米處，有一口青磚砌成的深水井。它的四周鋪墊著灰白色的花崗石板，在井口上安裝了一個用於提水的絞盤，這口井除了學校師生用水外，還供應這條街上大部分居民的飲水。

大門內約三米的地方，建有一座帶著遮雨屋檐的屏牆，正反面分別有紅色油漆寫的孫中山先生的《總理遺囑》和學生守則。院子中央有一座磚砌的升旗台，上面豎了一根三丈多高的木旗杆，從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每天早晨都要在這裡

舉行升旗儀式。學校的教室均是用土坯牆和灰瓦建造的平房，由前後兩個院子構成，前面是教室，後面是辦公室、寢室和食堂。出了後院的便門，便是一個簡單操場，只有一個沙坑、一副單桿和雙桿，還有一個看得出是本地木匠製作的簡易的籃球架。再往北，是一垛斷垣殘壁古城牆，顯示出這座鄉鎮久經風霜的古老歲月。

這是一所包括初小和高小在內的中心完全小學，它輻射著方圓十五里以內的廣大鄉村，招收走讀和住讀的學生。它是當時襄陽縣內辦得較好的小學之一，常年開設十五個班左右，在校生約五百人。

我和二哥是以插班的形式轉入到這所小學的，由於他年長於我，所以他被編入四年級，而我被分到三年級。舊時農村兒童啓蒙較晚，我們的年齡與當時就讀的年級是不相稱的，特別是二哥已經十六歲才讀小學四年級，年齡的確是偏大了。但是，相對於那些沒有機會上學的廣大農村的少年兒童來說，我們還算是幸運的。

從私塾轉入公立小學讀書，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跳躍。我初步嘗到了跳躍的甜頭，並暗下決心：我決不滿足於按部就班，只要有機會我就要跳級，要把過去耽誤的時間補回來。我內心裡湧動著出人頭地的念頭。

按照學校的要求，家居較遠的學生一般要住讀，但是要父母擔負我們兄弟倆的學費和食宿，這顯然是有困難的。父母親深知，學業是不能耽誤的，寸金難買寸光陰呀。於是，我們採取住讀不住校的變通的辦法。春、夏、秋季走讀，冬季借宿於校外熟人家裡。蔡陽舖北門外有一家油坊，父親做過食油零售生意，與油坊的老板熟識。老板同意我們在他的作坊裡借宿，自帶柴米起伏，這樣食宿比學校要便宜得多。這家作坊是一個四合院，堂屋有三間房，是用做榨油的；朝南的廂房有兩間，是主人的住所；朝北的廂房也有兩間，一間是灶屋，另一間是幫工的宿舍，我們就借宿在這個房間的一個旮旯裡。條件是十分差的，沒有床鋪，我們就打地鋪，冬天墊上厚厚

的稻草防寒。生活在這種環境下，衛生條件很糟糕，被子裡生了虱子，陽光好的天氣我們都要曬被子捉虱子。但是，令我們難以忍受的還是疥瘡。這是一種傳染很強的皮膚病，主要症狀是刺癢不止，特別是每當夜晚被窩睡熱以後，瘙癢更是難忍。我們癢得實在不行時，就用手抓撓，小丘疹抓破後流出黃色毒液，流到哪裡就傳染到哪裡，被抓破的小丘疹連成一片，小的有銅錢大，最大的足有雞蛋那麼大。當時我們沒有錢醫治，即使治療也很難斷根。倒是升入中學以後，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，疥瘡也就不治而癒了。但是，至今在我的身上還留下了很多的疤痕，這也算是那段生活的一個印記吧。

在春夏秋季裡，我們寧願起早貪黑地走讀，往返於家庭與學校之間，這樣我們就不必自己做飯了。同時，由於在家裡吃住，在經濟上也節省多了。走讀最麻煩的是午餐，我們既不能在學校搭伙，更下不起館子，只能帶乾糧。農村是吃季節飯，收獲了什麼就吃什麼，所以我們帶的乾糧

也是隨季節而變換的。一般情況下，我們是帶饅頭、鍋盔、高粱粑粑、蒸紅薯。在母雞下蛋的旺季裡，母親也會煮上幾個雞蛋塞到我們的書包裡。這種栖人「檐下」和風里去雨裡來的學習生活，一直持續了三年，直到我們畢業離開這所學校為止。

中心小學的學習與私塾不同，不僅有正規的教學計劃和教科書。而且學習的內容也多樣化，實施全面的基礎教育。我記得當時開設的課程有：國文、算術、公民、自然、音樂、美術、體育和餘興。所謂餘興就是課外活動，那時條件很差，幾乎沒有什麼運動器材，餘興時學生們都是跳繩；踢毽子、唱歌等，有時候由年級主任領導大掃除。至於早晚自習，並沒有嚴格的統一規定，既因人而異又根據季節的變化而時有時無。

在小學就讀期間，發生了一件使我們身心蒙受羞辱的事，使我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很大的傷害。一九四五年春，那是一個楊柳吐翠、桃花盛開的季節，和煦的春風一掃掛在人們臉上的愁

容。學校決定進行一次童子軍集訓，對象是十周歲以上的小學生，為期十天，受訓內容包括隊列訓練、野營和抗日救國思想教育。集訓按軍事化要求進行，一律要穿戴童子軍服和帽子。由於經濟的原因，母親沒有讓我們在學校統一製作童子軍服，而是用自家紡織的白布，用土辦法自己染色，由大嫂模仿剪裁，用手工給二哥和我各製作了一套。大嫂的針線活做得不錯，在我們看來，她做的衣服與學校統一訂做的並無多大的差別，我們穿著新衣服簡直像過年一樣高興。到了學校開訓那一天。我和二哥高高興興地前來參加，然而意料不到的打擊卻降到了我們的頭上。教官一副刁鑽古怪的模樣，他對我倆左看右瞅，總覺得不順眼，於是把我們從隊列中喊了出來，大聲喝斥道：「咋搞的！你們的衣服不合格，做不起衣服就不要讀書嘛！你們回家去吧，軍訓就不要參加了！」和我們一起受到懲罰的還有另外幾個學生，他們也是因為經濟困難而沒有統一製作童子軍服，個別學生甚至連自製的童子軍服也沒有。

我們帶著一顆受傷的心回到家裡，向父母訴說我們的委屈，知兒者父母也，他們勸慰道：「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，我們家雖窮，但沒有偷沒有搶，行不行不看穿著，要讓人家瞧得起，你們就得發奮讀書。」受到那次打擊以後，壞事變成了好事，更加激發了我自強不息的精神，同時，使我對於不平等、不民主現象產生了厭惡。我決心要努力學習，要以優異的成績討回自己的尊嚴。

果然，功夫不負有心人。在小學的三年中，我的考試成績每個學期都是班上第一名，特別是國文和算術兩門功課，每次都是考滿分。我的作文和日記，也常常受到國文老師的表揚，不時被他點名在課堂上朗誦，讓同學們刮目相看。我的最大弱項是音樂，不僅壓根沒有一點興趣，而且沒有一個音樂細胞。用音樂老師的話來說，我是一個「五音不全的人」。我至今也唱不好一首完整的歌，這到底是興趣使然，抑或是生理缺陷，我也說不清楚，反正我的大兒子維宇在小時候對

我的形容是：「爸爸唱歌像敲破鑼。」及至到了老年，依然故我，我曾戲謔：「我這一生是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哆、來、咪、發、嗦、啦！」

四、冒名頂替的初考

一九四七年夏天，無論對於我或是對於二哥來說，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，它關係到我們的發展方向，甚至決定著我們未來的前程。

這年夏天，二哥小學已畢業。他經過刻苦學習，雖說學習成績不甚突出。但也獲得了合格的小學畢業文憑。畢業後怎麼辦？這既是擺在他面前的問題，也是父母親必須統籌考慮的事情。二哥小學畢業時已經十九歲了，擺在他面前有兩種選擇：一是報考初中，如果能夠被錄取繼續學習；二是回鄉務農。成家立業，接父母的班。二哥對於報考初中繼續學習顯得信心不足，主要是他的年齡偏大，平素學習成績處於中等。於是，他決定放棄參加初中考試，回家務農做父母的幫手。父母親對於二哥的選擇表示支持，並為家裡

增添了一個強勞動力而感到高興。這年的冬天，父母親為二哥操辦了終身大事，從此他開始了從事農業生產的生涯。

我比二哥低一個年級，要到一九四八年夏方能小學畢業。當時，我在小學期間的學習成績一直是優秀的。無論是在校內或在當地，都還有點小小的名氣，父母親也是知道這一點的。或許是望子成龍心太切、或許是擔心我屈了才。他們提出了一個「調包計」，讓我持二哥的畢業文憑報考初中。那時，我也不知道打哪來的那麼大的勇氣，似乎未加什麼思索，就爽快地接受了父母之命。

冒名頂替換個名字是容易的，最大的困難是有鋼印的相片是不能更換的。雖然我與二哥的長相並不十分相像，但畢竟是一母之胞。再加上那時鄉下照相的技術水平不高，照出的相片清晰度也很低。家人反復比較，認為由我持二哥的文憑報考是可以混得過去的。

雖然當時棗陽縣城有一所中學，但是我們卻

選擇了離家更近的襄陽縣二中報考。該校位於我家西北部卅華里的雙溝鎮，它是襄陽縣北邊的一個重要集鎮，地跨兩縣，因此也招收棗陽籍的學生。

襄陽縣二中的入學考試是八月初，報名和考試連續進行的。我記得報名應考的那天是一個烈日炎炎的大晴天，母親讓我換上了她洗得乾乾淨淨的棉布製作的樹褲，爲我準備了乾糧，還爲我燒香念佛，祈禱菩薩保佑我。早飯後，二哥送我出門，大約送了兩里多後與我分手，他囑咐道：「要細心、沉住氣，一定要考出好成績！」

襄陽縣二中，下午到報名處詢問了報名的事宜，負責報名工作的是教導主任，他介紹說，報名除了出示畢業證書以外，最好提供一份保舉人的擔保書，後者只是保險措施，並不是必備的條件。所謂擔保書，就是由舉保人出具的推薦信，一般是由當地的保長；紳士財主等有頭面人物寫的手扎。那時的社會風氣很骯髒、有權勢人家的孩子可以不經考試入學，有錢的人可以買分或請

人代考，真是沆瀣一氣。我當然不可能獲得這種舉保書，也不可能享有這種優先錄取的權利。說實話，那時我心裡慌得直打鼓。我最擔心的並不是舉薦書，我也不怕考試，而怕的是冒名頂替的身份被識破了。所幸的是，那主任只是詢問我有沒有舉保書，並沒有認真地審查我出示的畢業證書。當他得知我沒有舉保時，他勉爲其難地說：「當然啦，你可以報名考試，但如果沒有舉保書，你錄取的機會是很小的。」我說：「老師，我老遠的來了，就讓我報名考試吧！」也許是出於同情吧，那位主任同意我報了名，發了准考證，總算是「冒名頂替」混過了關。

接著兩天是考試，應試有國文、數學、三民主義和自然四課，安排在兩天內進行。應試者三百多人，據說只錄取三個班共一百五十人。考試題目有一定的難度，但時間較爲充裕，因此我並不覺得慌張。但是，考完以後我忐忑不安的情緒卻滋長了起來，因爲流言四起，有的說，這次考的成績不好，要減少錄取的人數；也有的說，

優先錄取本縣的，有多餘的指標再考慮補外縣的；更有甚者說：凡是沒有舉保人的，一律不予錄取。在輿論壓力下，有些來自農村而沒有舉保人的學生感到沒有希望，在發榜之前就悄悄地離開了學校。

那時，我並沒有失去信心，抱著「不到黃河不死心」的想法，既然考了就要等個「水落石出」，不然回家也不好向父母交待呀！就這樣，我仍住在學校的教室裡，餓了就吃帶去的乾糧，渴了就喝涼水，祈禱幸運之神能降在我的頭上。

那既使人喜又令人憂的一刻終於到來了，第五天的一大清早，學校在校門口的牆上張貼出紅紙寫的告示，公布了被錄取的學生名單。那裡已擠滿了看榜的人，一般人都是從頭看到尾，由於我擠不過去，於是我就從尾向頭看。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中，怎麼才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呢？我心想，「玉」是一個特徵字，我試著從「玉」找起，看是否有「劉道玉」三個字。令我十分失望的是，看完一遍後，沒有看到「劉道玉」三個

字。我有些緊張了起來，情急之中，我忽然想到我現在已不是劉道玉了，而是冒名頂替成「劉道啓」了。我又正了正神，準備再從尾到頭看一遍，就在快看之際，忽然「劉道啓」三個字映入了眼帘、而且排在第三的位置上。霎時，既是激動又是幸福的熱淚奪眶而出，在這勝利喜悅之時，我明白了個道理：天保、地保、人保不如自保，有實力才有尊嚴！

當我到教導處去領取通知書時，教導主任對我的態度與報名時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他對我這個在入學考試中獲得了「探花」的學生表示了讚許。我領取了錄取通知書，馬不停蹄地連走帶跑地回到了家。我剛跨進門檻，母親從我的表情也猜出了個八九不離十，她焦急地問：「咋的，是不是取了？」「取了，我拿到了第三名。」我高興地回答。那個晚上，我們全家都十分高興，父親頗為動情地說：「福娃，你爭了氣，我們再苦再累也要支持你讀書，一直到大學畢業。」我說：「請爹媽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負你

們的希望。」

從小學跨入中學，這不僅意味著我從兒童時代進入少年時代，而且還意味著從初等教育跨進了中等教育。在襄陽二中學習期間，最大的變化有兩點：一是家庭經濟略有改善，父母親只供給我一個人讀書，使我能夠在學校會館食宿，較之過去生活正常得多了。二是我興趣廣泛了，除了學好學校規定的科目外，我還在課外時間閱讀一些小說，如《西遊記》、《水滸傳》等。有一次，我從老師那裡借來了一本《諾貝爾故事》的小書，我為諾貝爾的發明成就而震撼，從此十分崇拜諾貝爾，這本書對我的一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

在襄陽二中的學習時間很短，前後只有三個月的時間。大約十二月中旬，共產黨領導的桐柏軍成立了，接著解放了桐柏、鄧縣、棗陽、隨縣等廣大地區。面對這種局勢，地處解放區而為國民黨所管轄的襄陽二中宣布停辦，期末考試也被取消了，我也因此暫時輟學在家。

一九四八年春，襄陽二中合併到襄陽一中成立襄陽聯合中學，我隨之轉入了襄陽聯中。該校設在襄陽古城以西的廣德寺，位於襄陽與隆中之間，距襄陽二十多里，離隆中三里路。這裡遠離城市，是典型的田園風光，蛙呱鳥鳴，潺潺流水，麥苗兒青油菜花兒黃，是讀書的理想地方。但是，襄陽已處於被解放的前夕，解放軍和國民黨之間的戰事連綿不斷，人心惶恐不安。那一段學習就是在這種動蕩不定的形勢下進行的，很難說有多大的實際效果。

那時政治腐敗，貪污成風，學校當局克扣學生繳納的伙食費，每日三餐都吃不飽，導致搶飯風和打架風盛行。爲了不受欺負，保護自身的利益，學生中成立了許多的同鄉會、兄弟會、互助會等派性小團體。我是外鄉人，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，在學校中被認爲是墊底子最受欺負的群體中的一員，受氣、挨餓、被打是常有的事，我在這種惶恐不安中度過了三個月的學習生活。

到了七月初，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第六

縱隊和桐柏軍區第廿八旅共十四個兵團的兵力，開始圍攻襄陽城。這裡自古是軍事重鎮，三面環水，一面依山，易守難攻。當時駐守襄樊的是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康澤，他曾揚言：「鐵打的襄樊，堅固如金湯。」那時，每天炮聲隆隆，城內的官僚、豪紳和資本家開始向鄉下逃竄，城內國民黨再次加固防禦工事，實行宵禁。這一切表明，解放軍已兵臨城下，一場殊死戰爭即將到來，襄陽城危在旦夕。面臨這種形勢，學校動蕩不安，校方進行反動宣傳，說共產黨殺人放火、共產共妻，還明說共產黨專殺青年學生，並煽動學生隨校南下漢口，有些學生聽信了宣傳逃往漢口，但大多數學生不相信反動宣傳，自動離校回家去了。我當時不相信那些欺負人的反動宣傳。因為我的家鄉於一九四七年冬已獲得了解放，我目睹了解放軍在解放區實行減租減息、清匪反霸等政策，知道他們是真正幫助勞苦大眾翻身獲解放的。因此，我毅然決定離校，背上舖蓋捲兒，繞過國民黨的封鎖，穿過解放區，順利地回到了

我的家鄉。

我回家不久，七月十五日解放軍攻打襄陽城的總戰役就開始了。經過四天激烈的戰鬥，解放軍攻進了襄陽，並聽說在襄陽天主教堂內活捉了國民黨戰區司令康澤，真是大快人心。襄陽的攻陷，不僅表明鄂西北大片土被解放，而且還預示著解放武漢屈指可待了。

半個世紀以後，我故地重遊時曾寫了《隆中求學記》詩一首，回憶那一短暫的學習生活：

日行百里步隆中，
學海苦求一少童。
晨粥照得人消瘦，
一日三餐腹中空。
田園晨讀書聲隆，
諸葛廟中受啟蒙。
「躬耕」本乃孔明訓，
受用終生益無窮。